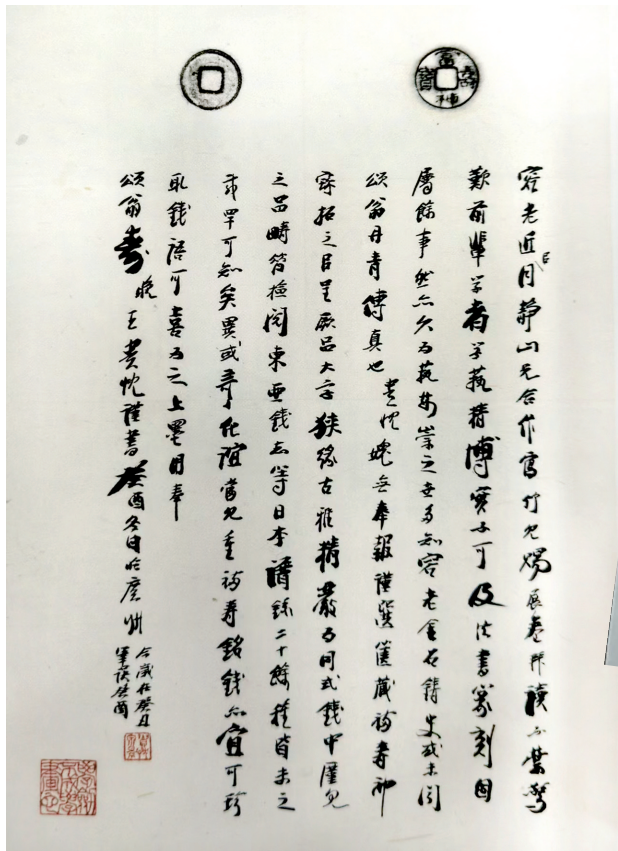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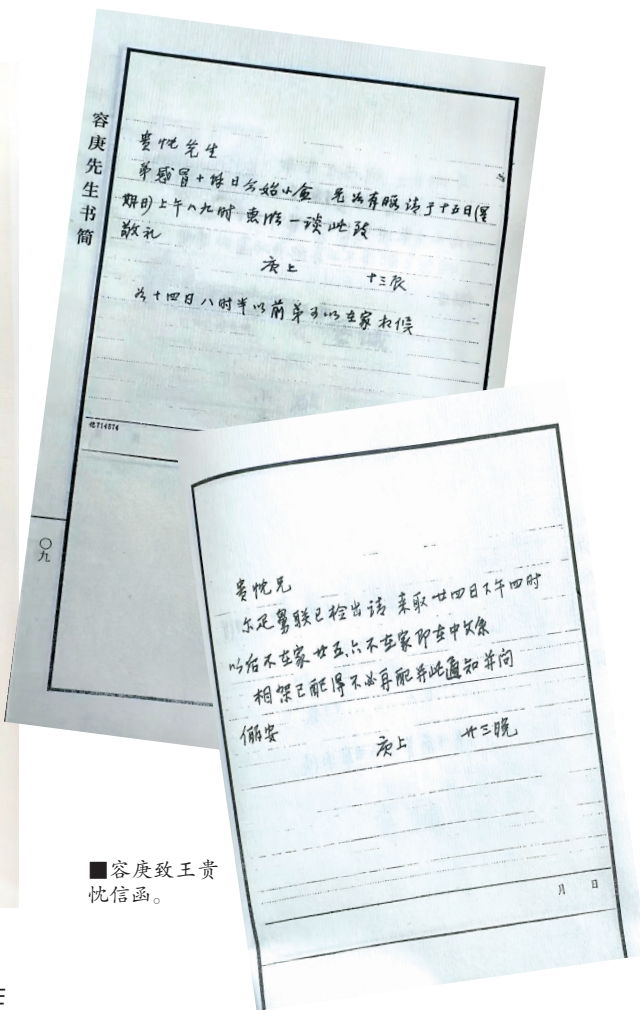


在岭南,文史大家王贵忱是容庚先生交友圈中来往较为密切的一位,王贵忱儿子、文史学者王大文向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回忆,他还是青少年时期,就时有跟父亲去拜访容庚先生。王大文回忆,“父亲常言,是容庚先生成就了他的今天。”

王贵忱先生曾言 容庚成就了他的今天



■王贵忱致容庚书信。



■容庚致王贵忱信函。

容庚敢说话的性格 让启功最为佩服

谈及容庚与启功的交往,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吴晓懿介绍,容庚、商承祚二老早年负笈北上,于京华求学时结识启功先生。尔后,他们常聚在一起商榷艺事,交往甚多。抗战时期,容、商二老返粤,任教于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,还常与启先生有书信联系。

启功先生曾公开表示,容庚先生最令他敬佩的是敢于说出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,高风亮节,堪称知识分子的楷模;又说自己从容先生的藏画中得到很多好处,而最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多年前他向容先生借摹《柏西亭画册》,不料容先生竟将此珍贵画册相赠。

《颂斋书画小记》曾记载这段传为艺坛佳话的轶事,清芬可挹,风怀可敬。容庚先生在这幅作品后跋曰:“余去年十一月至京,得见老友启元白先生,谈书甚欢。元白欲借余所藏柏西亭画册模古轴珍册,余年已七十八,欲散尽所藏书画,故允赠之。归来据视仿宋元明十二家之作,尤物移人,不无眷恋,今将九月,不能轻诺寡信,愧对吾友,因即邮寄,书此自忏。一九七三年八月容庚。”

另外,容老精于篆刻,好藏古印谱,常与启功先生往来书信讨论治印艺业,还将数册印谱相赠。启功曾回函表达对容老的深情厚谊,书札写道:“容老胜常,至为欣慰!载印谱册,蒙惠具承盛谊!印章艺术,实属门外,人手把玩,遥想光仪,为纪念之物则耳。容老藏印余册,不敢多领。专此敬申谢悃!不尽百一。即致敬礼。弟功谨上。”

1979年冬,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广州召开,启功先生赴会期间与容庚和商承祚先生畅谈书艺。启功先生认为目前所见字体可分这样几类:一是常见字体,如篆书、隶书、楷书、行书、草书;二是少见字体,如甲骨文、钟鼎文、石鼓文;三是新见字体,主要包括长沙马王堆楚帛书、侯马盟书、中山王铜器、睡虎地秦简等。如果没有第一类字体作为基础,只习第二、三类字体会事倍功半,达不到理想效果,必须要从第一类字体练起。容老十分赞成这种说法,他在指导学生时一直强调以常见字体作为基础,首先掌握结字和用笔,然后追求变化的书法风格。启功先生又特别强调要重视“真行结合之体”,指出“行书宜当楷书写,其位置聚散始不失度。楷书宜当行书写,其点划顾盼不呆板。”

父亲晚年每拿起容老信件,都不禁热泪盈眶

这些年,王大文和儿子王浩之花费大量精力,把王贵忱先生遗存书信逐一分类整理,编撰成册,其中就包括《容庚先生书简》一册,旧式线装印本让书信倍具历史厚重感,记者细细翻看,不得不感叹当时老先生们的相处之道,容庚先生比王贵忱先生年长三四十岁,但其信中多以“弟”自居,王大文解释说,“当时的先生交往,多以学问为上,不论年龄,一方面说明容老先生谦虚,另一方面,也说明他对父亲在某方面学术的高度认可。”

谈及两位先生的认识,王大文回忆介绍,上世纪六十年代,经商承祚先生介绍,王贵忱先生拜识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容庚先生。“容老长我父亲三十四岁,父亲对容老执弟子礼,毕恭毕敬,老人家的言传身教,使我父亲在金石考证、古籍版本、书法艺事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。”王大文说,“容老豪爽好义,他知道我父亲爱好钱币研究和钱币文献收集,经常把自己所藏的钱币古籍慷慨投赠,这些钱币文献大都收录在《可居室藏钱币文献图录》中,计有明刻本《泉志十五卷》、清刻本《泉史十六卷》、杨继震稿本《汉石古泉杂咏》和方若原拓本《药雨古化集咏》等二三十种之

多。父亲早期撰写的钱币学术论文《吴泉说》《说钱》《释铸》,容老给予了很多的鼓励,还亲笔题写了篇名《吴泉谱》和《唐乃钱铸》。父亲多次对家人说,没有容老,就没有他的今天。”

王大文介绍,王贵忱最为乐道的,是一九七四年协助容老编钤《颂斋印存》,这是为容老私藏用印的第一次结集钤拓,内收一百四十二枚印章,装订为十套,分别由容庚、黄文宽、启功、于省吾、欧初、方介堪、冯康侯、卢子枢、王贵忱等十家收藏。此事一时震撼印坛。

通读容老给王贵忱先生的信件,虽是简短几句,闲话家常,但也能感受到他们交往的亲与与紧密,甚至多为相约某日某时于某地相聚。例如其中一封写道,“贵忱先生,弟感冒十余日,今始小愈,兄若有暇,请于十五日(星期日)上午八九时,惠临一谈”。又有“尔正(雅)舅联已检出,请来取。廿四日下午四时以后不在家,廿五、六不在家即在中文系。”

在即时通讯普及的现今,难以想象在那个年代朋友间见面需要如此“仪式感”,但同时也能从中感受到友谊的深厚。王大文告诉记者,“由于同住一城,

父亲经常坐十四路公交车到康乐园容老家请益,因而通信并不多,且多在小纸片上写就,但吉光片羽,弥足珍贵。父亲是性情中人,晚年每拿起容老这些信件,都不禁热泪盈眶。”

尽管王贵忱与容庚通信不算多,但也有一封《拓钱祝寿献词》由毛笔写就,这是其书信里不多见的。信里写道,“容老近以同静山兄合作写竹见赐,展卷拜读,不禁惊叹,前辈学者学艺精博,实不可及。法书篆刻固属余事,然亦久为艺林崇之,世多知容老金石铸史,或未闻颂翁丹青传真也。贵忱愧无奉报,谨选篋藏福寿神宝,拓之以呈。厥品大字狭缘,古雅精严,为同式钱中仅见之品。畴昔检阅《东亚钱志》等日本谱录二十余种,皆未之载,罕可知矣。异或奇化,谊当见重。福寿铭钱,亦宜可珍,取钱语可喜,为之上墨,用奉颂翁寿。晚王贵忱谨书。”

“父亲由于事情繁多,书信多为钢笔写就,容庚先生给父亲的信也是如此,毛笔信迹较少。”王大文先生向记者开玩笑说,“倘若哪天在公开市场再遇到了父亲的毛笔书信,不用多考虑,立刻收藏(笑)。”

得容庚引荐,王贵忱与启功先生相交

王贵忱与容庚先生,互相也有多位共同的好友,包括于省吾、吴三立、罗继祖、启功等等,需要一提的是,其中不少好友均为容庚引荐,尤其是启功先生。王贵忱先生曾回忆,“启老非但精于书法,也善于篆刻之学。他对印学事无巨细,都是格外关心的。在他致我的书信中,有一封是毛笔书两开信。”启功先生同样保持十分谦逊,他在信中写道,“载印谱册,蒙惠具承盛谊!惟弟于印章艺术,实居门外,人手把玩,遥想光仪,为纪念之物则可耳。容老藏印除

册,不敢多领。专此敬申谢悃!不尽百一。即致敬礼。弟功谨上。”

启功先生对后学总是谆谆善诱。他知道王贵忱喜治古钱币,对他说钱币学过去是一门“显学”,后来也逐渐成为了一门有用的实学。王贵忱拿出过去的《吴泉说》小手卷,请启老审阅。先生阅后点头说,也题上几句,“功于金石之学所知无几,曾为学书,略搜碑刻。至于鼎彝款识,如云锦天章各焕异彩,钱币、印章之文字争奇于方寸之间,而妙趣无

穷,虽心俱好之,顾力有不逮,盖不徒无收购之资,亦且乏鉴别之识。今观贵忱同志珍藏古泉奇品,复读所撰《吴泉说》,豁然心胸,喜获多闻之益,爰志数语于后。”

据王贵忱先生回忆,他于一九七五年四月进京至小乘巷拜谒启功先生。临别时,启先生特持赠一册他的专著《古代字体论稿》,加钤容庚先生所治之印“启功元白”,并称此印为“《颂斋印存》漏收的集外印,印文带回给容老,望笑纳”。